

区域人群文化丛书

QUYU RENQUN WENHUA CONGSHU

# 八旗子弟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区域人群文化丛书

# 八旗子弟

刘小萌 著

丛书主编 邹逸麟 / 副主编 王振忠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八旗子弟

BAQI ZIDI

刘小萌 著

\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州方盛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

福州荣利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.75 印张 2 插页 137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ISBN 7-211-02641-3

G·1791 定价:7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

## 丛书总序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、变化和扩散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不同区域的文化、经济背景，孕育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自然条件纷繁复杂，风俗习尚也丰富多彩。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国人就对各地的人文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。《礼记·王制》篇曾指出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间者异俗。”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，世代环境的熏陶和文化传统的规范，造就了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各地人群。尤其到了明清时期，随着社会动荡，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，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，生计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地区人群的首要问题，救荒也就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。17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：

重农固为务本，但今人稠地窄处，竟有无田可耕，因其土俗，各有力食之路，便非游手，此亦救荒源头。（《祁彪佳集·救荒小考》）

这是对治生手段的一种崭新的认识。显然，各地区的芸芸众生，都“因其土俗”，开拓自己的“力食之路”。经过数代的家传户习，不同区域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，也就塑造出各地不

同的人群性格,并逐渐成为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。于是,在浙东的会稽山麓、镜湖之滨,涌出了大批砚田笔耕、游幕四方的绍兴师爷;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,则孕育出呼朋引类、席丰履厚的徽州朝奉;晋中盆地的祁、太一带,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商;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后裔,入主中原大地后,形成了一批靠铁杆庄稼为生的八旗子弟;……这些闻名遐迩,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区域人群,近数百年来,曾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中国人素有“沾着乡土的心理”,对桑梓乡土的眷念,总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天性。不同区域的人群成员在移居他乡时,都竭力保持某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和其他的社会风俗习尚。这往往会给侨寓地深深地打上区域人群的性格烙印,程度不同地引起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。

鉴于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对中国人整体作宏观性的探讨,但对“区域人群”作系统的区域性的文化透视,则迄今未见。因此,我们推出这套丛书,意在加强这方面的探讨,以期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基于以上认识,本书选择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,加以文化透视,力图透过对区域乡土背景、各地人群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,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。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,也盼望有更多的研究论著加入本丛书的行列。

编 者

1994年3月

# 目 录

丛书总序	(1)
一 导言	(1)
二 旗民分治,一代经制	(5)
(一) 居重驭轻,禁旅驻防	
——八旗子弟的分布	(5)
(二) 生则入档,壮则当兵	
——八旗子弟的职业	(22)
(三) 铁杆庄稼老米树	
——八旗子弟的钱粮	(27)
三 旗民畛域,日渐融通	(40)
(一) 旗民的交往与杂居	(40)
(二) 物本相感生,相感乃相亲	
——外族人的入旗	(44)
(三) 汉军子弟的出旗	(55)
四 濡染汉习,渐忘旧俗	(61)
(一) 文风蔚起,彬彬弘诵	
——八旗子弟的文教	(61)

(二) 八旗读书人,假借词林授 ——重文轻武习气的养成 .....	(68)
(三) 时趋难挽,旧俗陵夷 ——旗俗的流变 .....	(78)
(四) 满语荒疏,姓氏汉化 .....	(132)
(五) 宗教信仰的递嬗 .....	(149)
<b>五 盛极而衰,命蹇多乖 .....</b>	<b>(166)</b>
(一) 赳赳武夫干城器 ——八旗子弟代有英才 .....	(166)
(二) 纨绔膏粱尚虚华 ——八旗子弟的衰堕 .....	(175)
(三) 酒债寻常行处有,朝回日日典春衣 ——八旗子弟生计的困厄 .....	(189)
(四) 布靴宽袖夜方归,善仆营中个个肥 ——八旗兵丁的荒怠 .....	(197)
<b>六 破除旗汉界,谋生皆任便</b> ——辛亥革命前后的八旗子弟 .....	<b>(200)</b>
<b>主要参考文献 .....</b>	<b>(208)</b>

# 一 导 言

旧时北京有句俗话，叫作“不分满汉，但问旗民”。在清代，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。民人就是隶属省府州县之人，以人数众多的汉族人为主体的；旗人则是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人。八旗虽依满、蒙、汉不同民族成分编组，但起核心作用的始终是满洲族人，所以，旗、民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满、汉差别相对应的。旗人又称“旗下人”、“在旗的”，他们在行政隶属、权利义务、经济来源、政治地位、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别于民人，甚至所居住的地域，最初与民人也是泾渭分明的。这样一来，旗人便成为清代社会中人员最庞杂、特点最鲜明、影响最强大的一个区域人群。

有清一代，旗人被统治者视作“国家根本所系”而恩养有加，绝不是偶然的。清统治者一再标榜“本朝以弧矢戡定天下”，从清王朝的奠基到统治的稳固，主要凭借的是八旗的武力。嘉庆年间的《御制八旗箴》曾这样记述清朝肇建年代八旗的兴起：

皇清受命，抚有万方。白山毓秀，闾门衍祥。躬率子弟，基开沈阳。八旗布列，有正有镶。千城御侮，勋纪旗常。“白山”即今天东北的长白山脉。长白山山势雄阔，林深如海，山巅终年白雪皑皑，云雾缭绕，主峰峰峦环峙，拱着一池碧绿



清澄的湖水，此湖即文中所谓“闕门”，也就是天池。鸭绿江、松花江、图们江均以天池为源头，从这里奔涌而出。清皇室爱新觉罗氏视这一带为老祖宗“衍祥”发迹的神圣之地。

尽管满族的先民分布在“白山”（长白山）、“黑水”（黑龙江）间的广袤地带，但长白山却是其生息繁衍的中心地域。明朝末叶，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在长白山脉南段的苏子河畔（今辽宁省新宾县境）崛起的。明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他召集子弟数十人从这里起兵，开始了兼并诸部的战争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努尔哈赤以满族人原有的牛录制为基础，创建了八旗制度。“牛录”，是氏族时代的生产和军事组织。行军出猎之际，人们各依所属的族或寨行进，在每10人中立一首领，称“牛录额真”（满语：“牛录”是箭，“额真”是主的意思）。努尔哈赤为把战争中征服来的各部落统一组织起来，规定每300壮丁编为1牛录，每牛录设1个牛录额真；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，设“甲喇额真”；5个甲喇再构成一个固山，首领叫“固山额真”。满语中，“固山”的原意为“部落”，“甲喇”原意为“关节”的“节”，这意味着甲喇是联结固山与牛录的中间环节。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努尔哈赤编成了4个固山。这4个固山分别以黄、红、蓝、白四色旗作为标帜，于是改用旗色指称之，称作黄、红、蓝、白四旗；万历四十三年又增设镶黄、镶红、镶蓝、镶白四旗，合称八旗。

八旗组织将以往涣散的村寨、部落联合为一体，它不仅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，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。所有的八旗男丁兵农合一，出则为兵，入则为民，耕战两事，未尝偏废。战利品除贵族占有大部分外，所余部分“论功行

赏”，军费赋役各项开支由八旗通过牛录，向众旗人分摊。部落的统一和八旗的编设，奠定了满族国家的基础。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（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）称“汗”，建立了大金国（史称“后金”）。在以后十年里，努尔哈赤凭借着所向披靡的八旗军队横扫明军如卷席，将明朝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据为己有，这就是《御制八旗箴》中津津乐道的“躬率子弟，基开沈阳”那段光荣历史。

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赫图阿拉迁至沈阳，旗人首次大规模迁入了汉族人聚居的辽沈地区。这以前，由于受北方寒冷气候和山地原始林带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，满族的先民长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业，传统的狩猎活动使他们精于骑射。迁入久经汉民垦殖的辽沈农业地区后，满族人便开始了由“引弓之民”向“农耕之民”的嬗蜕。八旗在辽沈一带实行大规模“计丁授田”，每名壮丁授给田地六晌（一晌相当六亩）作为份地，俗称“一个壮丁地”，五晌种粮，一晌种棉。而旗人“一家衣食，凡百差徭，皆从此出”（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卷上）。

明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清太宗皇太极继承了汗位。十年中，他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全面取仿明朝制度，并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宣布改汗称帝，更定国号为大清。

八旗组织建立初期，以满族人为主要成分。随着清国疆域的急速扩大，汉族和蒙古族的降众迅速增多。为适应这种变化，皇太极陆续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，使之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八旗制度的整体。清军入关前夕，八旗共有615个牛录，其中满洲八旗319个，蒙古八旗129个，汉军八旗167个，规模比八旗初创时显然大得多。

崇德八年(1643年),皇太极病歿。第二年,第九子福临(清世祖)即位,改年号为顺治。顺治帝即位时年仅6岁,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。顺治元年(1644年),多尔衮亲率八旗劲旅撞入山海关,攻克了明都北京。接着,清廷从沈阳迁都北京,很快建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。伴随迁都而来的是八旗人口的又一次迁徙高潮。除很少一部分留居辽沈“发祥重地”外,绝大多数八旗兵丁举家携眷、长途跋涉,“从龙入关”。从此,八旗子弟进一步远离了世代生息繁衍的“白山黑水”,深入到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原农业社会。此举孕育了满族社会经济的全面飞跃,同时也使它的传统文化遇到先进的汉文化的有力挑战。在以后的年代里,政治上享有特权的满族子弟逐渐为被统治的汉族的文化所征服。

俗话说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不同区域的文化、经济背景,陶熔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。清代旗人群体,是在不断迁徙和频仍分合中形成的,它本来就是不同民族成员的结集,不可避免地受到多元文化的浸润;何况旗人群体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等级社会,上起清朝皇室、天潢贵胄,下至普通八旗子弟以至为数众多的“包衣(家奴)下贱”,无不包容其间。凡此种种,决定了八旗子弟的人群性格具有丰富的内涵。

那么,在17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的将近270年中,八旗子弟的生活之路是怎么一步步走过的呢?这要由八旗子弟“从龙入关”说起。

## 二 旗民分治,一代经制

顺治元年(1644年)清廷定鼎北京,很快确立起“旗民分治”的两元社会结构,即在广大汉族地区继续沿用明朝制度,设置省、府、州、县各级地方行政机构,任命总督、巡抚、知府、知州、知县等管理民政。与此同时,千方百计地维护本族的旧有社会组织和制度,将全体满洲人和一部分早先收编的汉人、蒙古人等“俱隶八旗”。为保证兵源和军队的战斗力,而将兵丁列入不同于民籍的“军籍”的做法,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屡见不鲜;为对异族的统治和奴役,而让自己的整个民族日益脱离生产而以当兵为主要职业,在北方若干少数民族如北魏拓跋、辽契丹、金女真所建政权中亦不乏先例。清朝统治者在祖述这些做法的同时又多所发明,使“旗民分治”成为一项基本的制度。

### (一) 居重驭轻,禁旅驻防

#### ——八旗子弟的分布

清朝入关后,为了以人数较少的八旗兵丁有效地控制全国,采取了“居重驭轻”重点配置的政策。北京是统治的中心,也是八旗驻防的重点所在。以后基于镇戍地方的需要,将一部

分旗兵陆续派往各地驻防,于是形成“禁旅八旗”和“驻防八旗”的区别。

## 1 屯聚京师的八旗禁旅

在顺治元年清朝定鼎于北京以前,北京曾作为辽的陪都和金、元、明三朝的都城。除明朝外,辽契丹、金女真、元蒙古以及清满洲的统治者都是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。北京城之所以为历代王朝尤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所青睐,主要是因为它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重要的战略位置。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,永定河的古冲积扇上,背依群山,面向开阔的平原。北面以燕山山地与蒙古高原毗邻,西以太行山脉与黄土高原接壤,南面是一陌平川,遥瞰渤海。燕山、太行山两幅巨大的屏障,从东北和西北两面围拱着北京所处的小平原。两山相会处,形成的狭长峡谷——关沟,历来是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重要交通孔道。

正是由于这样险要的地位,北京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,燕国就定都于此。秦统一中国后,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,在原诸侯国已有的长城基础上,沿山势修筑了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。以后,在以长城为界展开的游牧、农耕民族争夺势力范围的拉锯战中,北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益显突出。游牧的契丹族、蒙古族以及当初以渔猎为主要生业的女真族、满洲族统治者选中这里,是为了在背依“发祥”故地的同时,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广大汉族地区实施有效统治,而明初统治者大规模营建北京,则首先基于与塞北盘马弯弓民族比试

高低的战略动机。

清朝定都北京，伴随而来的是八旗人丁的大规模迁徙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目睹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。

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，来的不光是女真人，还有奴儿干人、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。鱼皮鞑靼在更加东面，与日本处于同一海拔高度。那里的人被称为鱼皮，因为他们穿用坚固的鱼皮制造的盔甲或胸甲。不仅这样，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，鞑靼人管他们叫“阿尔加鞑靼”。（《鞑靼战纪》）

卫匡国笔下的“鞑靼人”，并不是指狭义上的蒙古人，而是包括满洲人和东北沿边地区的其他渔猎民族如赫哲人等。从清初到近代，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始终以“鱼皮鞑子”称名于世。用鱼皮加工成服装、甲冑，正是这些民族文化中的基本要素。当时，满族的几乎全部，以及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族人、赫哲族人、汉族人、朝鲜族人，都随同清朝入关。由于他们统一穿着满式服装，依照满族传统实行剃发，难怪卫匡国要将他们大而化之地统称为“鞑靼人”了。

从历史上看，辽代契丹族和元代蒙古族在建都北京后，大批居民仍留居本族的故地。金代女真族，在海陵王、金世宗后，大举南迁汉地与汉族杂居，从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。清朝入关同时，满洲旗人大举迁入内地，对其自身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清朝定都北京时，沿用关外旧制，颁布了几条重要政策：

第一，强迫所有汉民剃发易服。明朝，汉族男子都蓄长发、梳髻。满族的传统是男子剃发，即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

余，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。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外，头顶四周边缘的头发必须及时剃除，不许养长，叫作“薙(剃)发”。清朝把汉人剃发，改从满族发式，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。满族的装束仍保持着渔猎时代的传统。由于采猎生产的需要，在装束上，男子多穿“马蹄袖”的袍褂，袖口窄狭，上长下短，马蹄袖口盖在手背上，袍两侧开襟，腰束布带，上系小刀、匙、箸等日用品。妇女穿长衫，天足。清朝在强迫汉族男子剃发留辫的同时，规定他们必须着满式衣冠。不过，妇女例外，出家人(和尚、道士、尼姑)和乞丐例外，俗称为“三不降”，头发服饰可不改旧制。当时汉族男子全依满式，妇女则仍按明制凤冠缠足，上衫下裙，所以有“男降女不降”之说。道士修炼，以不剪不剃为玄规；和尚以六根清静、拔除烦恼为三宝律例，头发早已剃去；况且道士、僧人的服装也不便更换。关于他们的发式，又有“长不剃，短不编”的俗谚。乞丐的衣食全是乞讨得来，无钱剃头换衣，所以也在“不降”之列。但乞丐的“特权”未能保持多久。随着清王朝建立起对中国的统治，满族的服装、发式完全取代了汉族的服装和发式。

第二，在畿辅地区大规模圈占汉民田地。清朝为了安置迁入关内的大批八旗王公、官兵，在近京五百里内——东起山海关，西达太行山，南至河间，北抵长城——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，总共圈占 16.6 万余顷。所圈土地，小部分为皇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占有，建立起官庄和王庄；大部分分给八旗官兵作为旗地。由于八旗组织最初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组建的，兵农合一，因此与明朝军队不同，八旗兵丁的一切装备都需自备，这包括作战用的马匹、兵器、甲冑。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。

为此,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了“计丁授田”,即分给八旗兵丁一定数量的土地,以解决其经济来源问题。这也就是清人所说的“本朝计丁授田,兵马器械皆从此出”(《皇清奏议》卷9)。顺治年间,八旗壮丁共有34.6万余人,旗地达到14万余顷,占有圈地总额的绝大部分。

与圈地活动并举的一项政策,是在畿辅地区实行满、汉分居(实际上是旗、民分居)政策。这项政策最初是由顺天巡按柳寅东在顺治元年(1644年)十二月提出的。他提出: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,莫若先以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,使满洲人自占一方。而后以察出无主地,与有主地互相兑换,务使满汉界限分明、疆理各别而后可。虽然实行满、汉分居的理由被冠冕堂皇地说成是为了避生事端,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恣扰民人事件。凡居住旗地内的民人,通常被强令迁出,土地、房舍落入新迁入的旗人之手。这样,清朝统治者首先在北京城周围方圆五百里内,用暴力手段强制划定了旗、民的畛域。

第三,在北京城内实行旗、民分城居住制度。顺治三年(1646年)二月,清廷借口京城内“盗贼窃发”,谕兵部严满、汉分城之制。但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并不顺利,所以在顺治五年八月重申了前令,要求内城的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外城(即南城)居住,限期在年底以前搬完;寺庙僧道可以不动,但不准留人住宿。当时的北京城保持着明朝多次重建后的面貌,呈“凸”字形。内城在北,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;外城在南,东西各宽于内城500米有余。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的大规模清理,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无论官民一律迁居外城,而内城



则成了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、官兵聚居的地区。

居住内城的八旗称“禁旅八旗”，又称“京旗”。禁旅八旗从四面拱卫着内城中央的皇城。八旗的分布，是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确定的。东方属木，金克木，金为白色，故正白、镶白二旗驻东城；西方属金，火克金，火为红色，故正红、镶红二旗驻西城。其他各旗也是按五行生克说确定防地——正黄、镶黄二旗驻北城，正蓝、镶蓝二旗驻南城。又以皇城（紫禁城）中线分左、右翼，东部四旗为左翼，西部四旗为右翼。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，如左翼镶黄旗有10个汛地，正蓝旗有11个汛地。汛地内又设堆拨，汛地与堆拨间设立栅栏，设兵值勤。在清初，北京城是作为军事大本营来配置旗兵的，以后城市的军事性质逐渐减弱，但驻防区划仍沿袭不改，直至清末。

入关以后，八旗“牛录”改称“佐领”，“甲喇”改称“参领”，同时改定八旗官员汉译名称：“固山额真”称都统，“美凌章京”称副都统，“甲喇章京”称参领，“牛录额真”称佐领。各佐领在行政上均隶属本旗都统。都统“掌八旗之政令，稽其户口，经其教养，序其官爵，简其军赋”，是各旗的最高长官。各旗均设都统衙门（后俗称“档房”），举凡军政、户籍、铨选、司法、婚娶丧葬、稽察不轨等事务，各有所司，从而完善了旗人的管理体制。

佐领，是八旗的基层组织。每佐领一般辖管数十户，每户约计数口以至数十口人丁。他们均按本旗方位被集中安置在某个街区的某条胡同。佐领的长官也称“佐领”，职掌人口、田宅、兵籍。佐领权力很大，虽然他的官阶只是四品，但本佐领旗人即使位居公侯，对他仍客客气气，不敢怠慢。

清初满洲八旗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，氏族长、部落长率部